图书情报工作
第 66 卷 第 2 期 2022 年 1 月

古籍历史修复遗存的形式、处理措施及启示*

■ 王国强
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郑州 450001

摘 要：[目的/意义]历史修复遗存是古籍的组成部分，是新的古籍修复周期处理的对象，研究古籍历史修复遗存不仅能丰富古籍修复技术，更能提高古籍修复质量。[方法/过程]分别运用归纳法和案例法研究古籍历史修复遗存的形式及处理措施。[结果/结论]古籍历史修复遗存形式包括修复材料、修复方法及其印记等。古籍历史修复遗存处理应依据具体情况分别实施保留、修复和清除措施。古籍历史修复遗存对中国古籍修复工作的启示是积极研发古籍历史修复遗存处理技术、优先选择古籍物理修复技术、全面推广古籍优良修复技术和系统建设古籍修复档案。

关键词：古籍修复 古籍历史修复遗存 修复周期 修复技术 古籍保护
分类号：G264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22.02.008

1 引言

古籍历史修复遗存是指历史修复活动留存在传世古籍中的材料、方法及印记等。在时光的流转中，经历修复周期的古籍越来越多，古籍中的历史修复遗存也越来越丰富。历史修复遗存是古籍修复周期处理的重要对象，其处理措施比单纯的古籍本体修复更为复杂。全面认识和正确处理古籍历史修复遗存不仅能丰富古籍修复技术，也能提高古籍修复质量，应当引起古籍修复理论和实践界的关注。

古籍修复界对古籍历史修复遗存形式及其处理措施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1980－2006 年为第一阶段，2007 年至今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研究成果逐渐增多，研究思路由对历史修复遗存实施清除发展到清除和保留并重。1980 年，肖振棠和丁瑜首先讨论了年代久远不合规格的古籍历史修复遗存的清除方法[1]32－33，1995 年，潘美娣提出相同的意见[2]。2002 年，张平介绍了《永乐大典》整旧如新、改变装帧形式和整旧如旧三种历史修复遗存及处理措施[3]。两年后，杜伟生讨论了《永乐大典》装帧形式和书皮两种历史修复遗存的处理措施[4]。2006 年，张平总结敦煌遗书历史修复遗存补纸的处理措施，提出建立统一的标准[5]，胡玉清介绍了敦煌遗书补纸和细麻绳两种历史修复遗存的处理方法[6]，张志清提出保留敦煌遗书部分历史修复遗存[7]，林世田等总结了敦煌遗书古代修复遗存的形式和特点[8]。

在第二阶段，研究成果更为丰富，研究思路强调对古籍历史修复遗存的保留或保护性修复。2007 年，杜伟生提出应酌情保留各个历史时期的修复信息[9]。2010 年，张平指出应保留历史修复遗存改装过的装帧形式[10]，林世田勾勒了敦煌遗书 4－11 世纪的修复遗存[11]，谷锦秋调研了古籍历史修复遗存现状[12]。2016 年，方广锠介绍了 20 世纪 80 年代后英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敦煌遗书历史修复遗存中化工材料的清除情况[13]13－15，朱振彬提出保留各个时期的古籍历史修复信息，对历史修复遗存尽量进行保护性修复[14]。2016－2019 年，朱振彬[15－16]、崔志宾[17]和田婷婷[18]分别对“天禄琳琅”专藏历史修复遗存形式及处理措施作了思考。2018 年，王国强等总结古籍破坏性历史修复遗存并提出预防措施[19]。2019 年，万群认为对于不影响古籍保护的历史修复遗存不应施加过多的处理[20]118。

在古籍历史修复遗存处理实践方面，国家图书馆先后实施的《永乐大典》修复、敦煌遗书后续修复和“天禄琳琅”专藏修复越来越关注历史修复遗存，“天禄琳琅”专藏修复明确提出“前人的修复痕迹要给予保留”原则[21]。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古籍修复技术体系建构及其应用研究”（项目编号：21BTQ001）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王国强，教授，博士后，E-mail：freewgq@zzu.edu.cn。
收稿日期：2021－06－02 修回日期：2021－09－05 本文起止页码：74－81 本文责任编辑：易飞

综上所述,古籍修复界对古籍历史修复遗存形式的认识不断深化,提出的古籍历史修复遗存的处理措施能够结合其多样化的实际,但研究范围多局限于几类重要的古籍,研究内容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不强;在古籍修复遗存处理实践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但也亟需科学化和规范化。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揭示古籍历史修复遗存与古籍修复周期的关系,总结古籍历史修复遗存的主要形式,探讨古籍历史修复遗存处理原则和措施,分析古籍历史修复遗存对中国古籍修复工作的启示,以指导古籍修复实践。

2 古籍修复历史遗存是历次古籍修复周期的产物

古籍历史修复遗存是历次古籍修复周期累积的结果。在古籍修复界,修复周期习惯上指经过修复的古籍进入再一次的修复活动[17],或者指连续启动两次古籍修复所需间隔的最小时间。古籍修复周期多久产生一次,目前尚无确切数据,因为影响古籍修复周期形成的因素非常复杂:古籍的制成材料、装帧方式不同,保存环境也有差别,每个修复周期使用的修复技术及修复规模不同,修复周期启动的最佳时间节点也很难确定,另外,古籍老化速度在其存世的不同阶段也有差别,不同时期对古籍修复最小干预原则的理解也不尽一致,古籍修复周期的频次确实不易确定。

尽管如此,古籍修复界还是对古籍修复周期进行了一些研究。20 世纪 60 年代,赵万里首先提出修复过的古籍一百年内当无问题,百年之后就是第二代、第三代的事了[22]。2010 年,张平提出“根据目前保存古籍的修复周期看,一般二三百年就需要再次修复”[10]。稍后有学者提出,“以既往经验和目前技术水平而言,若修复工作安全有效,同一修复对象进入下一修复周期往往需要数十乃至上百年”[23]。上述三家根据古籍和修复质量的差异,判断古籍修复周期分别为数十年、百年左右和二三百年。

古籍历史修复周期案例基本证实了这些数据的可靠性。如国家图书馆于 2013 年启动“天禄琳琅”专藏的修复工作,这次修复周期涉及的部分古籍,已分别于清道光元年(1821)、清同治十三年(1874)经过修复[15],修复周期分别为 192 年和 139 年。再如上海辞书出版社收藏的宋刻《入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纲目》在明隆庆元年(1567)经过修复,257 年后,即清道光四年(1824)又经修复,185 年后,即 2009 年又经历一个修复周期[14]。再如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宋版《重雕足本鉴诫录》于明万历元年(1573)经项元汴修复,232 年后的清嘉庆十年(1805)又经黄丕烈修复[24],至今 215 年过去了,该书状态良好,短时期内当不会进入下一修复周期。

目前知道的最频繁的古籍修复周期发生在现存最早刻本《金刚经》身上。这部先后收藏于敦煌、英国国家博物馆和英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在 1 000 多年前已经过多次修补[25]41,直到 20 世纪初揭下原补纸,改换褙纸,该修复周期长达千年。1920－1960 年间,该书又经历 4 个修复周期,每次采用的通卷托裱技术都使其状态更加恶化,直到 1987 年,该书开启了新的修复周期,揭去 5 层褙纸[25]98－107,可知从 20 世纪初至 80 年代,该书经历了 6 个修复周期,平均修复周期约 12 年。

结合学界判断、古籍修复时间信息及存世古籍实际,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出一般情况下不同古籍的修复周期:条件很差的,修复周期为 10 余年;条件优良的,修复周期为 200－300 年;大部分古籍,条件中等上下的,修复周期为 150 年左右。这些数据表明古籍修复周期的时间并不太久,在古籍漫长的生命周期中,修复周期的产生是常态化的,多发性的。

古籍历史修复遗存的数量、质量和风格是历次古籍修复周期的产物。具体表现在:①古籍历史修复遗存的丰富程度是古籍修复周期的频次和修复规模决定的。一般来说,古籍修复周期的频次越多,历史修复规模越大,修复遗存越丰富。②古籍修复周期应用的技术决定着古籍历史修复遗存的特点和质量。历次古籍修复周期中,不同时代和地域的修复技术、技法决定着古籍历史修复遗存的特点和质量,有些遗存显示有的修复周期起到了加固古籍书叶、延长古籍生命周期的作用,有些遗存显示有的修复周期因修复材料、方法和工艺不善产生了负面影响。③不同古籍修复周期的审美观念决定着古籍修复遗存的美学风格。在不同修复周期中,社会风尚、修复理念、收藏者和修复人员品位都有差异,古籍历史修复遗存的美学风格也不同。

3 古籍历史修复遗存的主要形式

3.1 修复材料

3.1.1 修复用纸

古籍历史修复遗存纸张包括补纸、溜口纸、托裱纸和衬纸等:

(1)补纸在古籍历史修复遗存中体量最大,类型

繁多:有素纸,有有字纸,有手工纸,有机制纸。修复周期较多的古籍,补纸可有多层;补纸的粘贴,有手撕的补纸纤维与书叶纤维微搭的,大多是剪成的方块纸粘贴的[11]。

(2)古籍历史修复遗存溜口纸较多,种类多样,以薄皮纸最为常见。

(3)北方干燥多风,古籍书叶风化脆化严重,强度下降[26],修补困难,古籍历史修复遗存托裱纸较多。现当代南方古籍历史修复遗存也有少量托裱纸。多层托裱纸粘在一起,则是多次托裱的结果。

(4)古籍历史修复遗存的衬纸主要见于以下情况:①修复后不平整的古籍,需要衬纸增厚或垫平;②较薄的古籍书叶,其文字可以透到另一叶上,纸与纸之间也容易吸附,需添加衬纸解决;③张力减弱的书叶,用衬纸增加张力;④较薄的书册,需要衬纸增厚;⑤金镶玉装古籍;⑥破损且纸张较薄的书口,同时需要溜口和衬纸,有的修复师将书口直接粘在衬纸上,连衬带补,让衬纸发挥补纸的作用[17]。

3.1.2 修复粘合剂

古籍历史修复遗存粘合剂基料主要有小麦面粉或淀粉、石花菜、白芨和楮树汁等:

(1)小麦面粉或淀粉分别是北方和南方最为常见的古籍历史修复遗存粘合剂基料。传统糊方常添加多种药材和矿物,如薰陆香、白矾、黄蜡、川椒、石灰、芸香、皂角和桐油。

(2)石花菜是流行于广东的古籍修复粘合剂基料,其主要成分是琼胶,这种浆糊粘结后的纸张柔软性好,可逆性强,把石花菜掺入小麦淀粉中调制,效果更佳[27]。广东近代藏书家、学者伦明用石花菜浆糊修复家藏古籍[28],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也长期使用石花菜浆糊修复古籍。

(3)白芨和楮树汁都是植物胶类粘合剂基料,粘性大,可逆性差,使用这类浆糊粘贴的补纸和托裱纸,揭旧时容易损坏书叶,因此这类浆糊主要见于纸张较厚的佛经。敦煌写卷早期修复遗留中,就有植物胶类粘合剂,或许即此类物质,其色棕黄,极难溶解于水[10]。

(4)近代以来的古籍修复遗存中,也有化工浆糊、胶水和胶带。

3.1.3 高分子加固材料

现当代古籍修复遗存中出现了高分子材料。化学制丝网是20世纪中期用于保护脆弱纸张的材料,聚酯膜是20世纪80年代国际古籍修复界常用的材料,目前这些高分子材料大多已被清除。

3.2 修复方法

划栏补字、裁切天头地脚书背、更换书皮和改变装帧形式是常见的古籍历史修复遗存方法。

(1)在敦煌遗书早期历史修复遗存中[8],尤其在明清时期古籍修复遗存中,划栏补字都很常见。由于该方法违背古籍修复应保持其原真性的要求,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废弃。

(2)古籍历史修复遗存中有裁切见新的古籍天头地脚书背,有按原书叶的规格把裁切部分重新补齐的古籍天头地脚书背[14]。

(3)书皮容易受损,古籍修复时习惯更换书皮,以实用为目的的历史修复遗存,更是如此。

(4)宋元时期的蝴蝶装和包背装古籍大多成为历史修复遗存中的线装,如国家图书馆藏品就是如此[7]。上海辞书出版社收藏的宋刻《入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纲目》的线装遗存也由蝴蝶装改装而来[14]。据一家北方古籍收藏单位统计,金镶玉装在19、20世纪的古籍历史修复遗存中比重较大,在种数和册数上分别占古籍历史修复遗存总数的28%和45%[12]。

4 古籍历史修复遗存的处理原则及措施

4.1 古籍历史修复遗存的处理原则

古籍修复原则规定着古籍历史修复遗存处理的理念、措施的选择及实施。文物修复的可识别、最小干预和可逆性原则于20世纪中期由意大利学者布兰迪提出[29]90,并被写入多种国际性和中国文物保护文件,获得了包括古籍在内的文物修复界的认同。古籍历史修复遗存处理是修复工作的一部分,同样应该遵循这三大原则。

(1)古籍历史修复遗存处理可识别原则是指处理后的古籍修复遗存部分与古籍本体保持整体和谐又有所区别,即远观一致,近看有别,其内涵是:①通过一定的处理技术保持不同古籍修复周期的修复遗存之间、修复遗存与古籍本体之间的协调与区别;②注意保存各个古籍修复周期的遗存信息;③尊重古籍历史修复遗存多样化风格[30]。

(2)古籍历史修复遗存处理最小干预原则是指任何必要的古籍历史修复遗存的处理措施应当保持最小规模,其内涵是:①以实现保护古籍和历史修复遗存为最高目的;②在需要处理的古籍历史修复遗存部分实施必要的最小规模处理;③任何历史修复遗存处理措施都存在最小规模。

(3)古籍历史修复遗存处理可逆性原则是指未来能够将处理过的历史修复遗存的古籍恢复到采取处理措施之前的状态,其内涵是对古籍历史修复遗存处理的材料、过程和方法是可逆的。可逆性原则显示了修复界对修复风险的了解。由于可逆性原则在实践中难以完全实现,因此文物修复界近年来有些学者提倡更易实现的“可再处置性”或“可持续性”原则[31]。

古籍历史修复遗存处理的理念是尽量维持古籍历史修复遗存的形态[25]101,以维持古籍的真实性。

4.2 古籍历史修复遗存的处理措施

古籍历史修复遗存材料和方法复杂多样,质量各异,存在状态有别,在新的修复周期中,对古籍历史修复遗存的处理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分别采取保留、修复和清除等措施。

4.2.1 古籍历史修复遗存的保留

存世古籍中的一切信息(包括修复)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应该受到尊重,不影响古籍保存质量的历史修复遗存应予以充分保留,使古籍发生了变化的某些历史修复遗存也要尽可能保留[7],修复的目的不是为了保持修复风格的统一。部分古籍历史修复遗存的形式、状态及保留措施如表 1 所示:

表 1 古籍历史修复遗存的形式、状态及保留措施示例

遗存形式	遗存状态	保留措施
补纸	造成书叶加厚但不影响古籍保护质量的补纸	保留
	修复质量尚好且补处柔软的补纸	保留
	轻微破损但不影响古籍利用和保存的补纸	保留
	无文献价值的有字补纸[5]	保留
	多层叠加而不影响古籍保护的补纸[20]118	保留
溜口纸	与古籍书叶质地、颜色和厚薄近似的溜口纸	保留
	与古籍书叶质地、颜色和厚薄有些差别但粘接尚佳的溜口纸	保留
托裱纸	揭开后会导致古籍损伤的托裱纸	保留
	已成碎片的书叶背后的托裱纸	保留
衬纸	为加厚书册所用的衬纸	保留
	未对书叶长久保存有负面影响的衬纸	保留
	修复后物理强度尚可的衬纸	保留
	连补带衬,书叶平整并状态良好的衬纸[14]	保留
改装过的装帧形式	古籍装帧形式经过改装,年代久远[32],又无法确定其原貌[33]	保留现状
	具有文物价值的经过改装的古籍装帧形式[4]	保留现状
书皮、扉页	古籍书皮、扉页经过改换,状态良好,且年代久远	保留现状
天头地脚书背	裁切见新的古籍天头地脚书背	保留现状
	裁切后接补的古籍天头地脚书背[14]	保留现状
	有的古籍书脑过于狭小,订线后容易压边框和文字,需要接书背。修复遗存接背法有衬纸接法(以衬纸接宽书脑)、不衬纸接法(把纸条一边粘在书脑,另一边回折与书背边缘相碰)和拼接法(用纸捻连接古籍与接书脑的纸条)等[1]49－51	保留现状
划栏补字	划栏补字尚未损坏,补纸也没有酸化	保留
特殊材料	敦煌写卷中连接破损纸张的细麻绳[6]	掏补法修补后,保留原处

4.2.2 古籍历史修复遗存的修复

有些古籍修复历史遗存由于技术不规范或年代久远产生了问题,但是并没有损坏古籍,或者能够在新的修复周期再利用,应尽量通过修复继续使用。部分古籍历史修复遗存的形式、状态及修复措施见表 2。

4.2.3 古籍历史修复遗存的清除

当古籍历史修复遗存既无法保留,又无法修复时,才能实施清除。清除的历史修复遗存包括不合格或有害的修复用纸、高分子材料、粘合剂及印记等。应把清除部位拍照,描述,并把图像资料与清除的材料一起存入修复档案。部分古籍历史修复遗存的形式、状态及清除措施见表 3。

5 古籍历史修复遗存对古籍修复工作的启示

5.1 积极研发古籍历史修复遗存处理技术

在古籍新的修复周期,历史修复遗存的处理技术构成修复技术的重要部分;这些处理技术的复杂性集中表现在历史修复遗存的去除上,因为不论是清除,还

表 2 古籍历史修复遗存的形式、状态及修复措施示例

遗存形式	遗存状态	修复措施
补纸	质量较好、修复接缝处过宽但不影响古籍文字的补纸	揭下修复后贴回原位
	古籍书叶状况不佳且厚硬的补纸	揭下修复后贴回原位
	破损的无字补纸	揭下修复后贴回原位
	影响书叶平整的补纸	揭下展平书叶后贴回原位
	遮掩文字的补纸	揭下拍照和录文后贴回原位[7]
	有文献价值的有字补纸	揭下有字补纸重新用补纸修复。连缀成文的有字补纸视为一种新文献[20]118
	方块补纸	揭下缩减搭口后贴回原位
	多层叠加而影响古籍保护的补纸[20]118	揭下修复后贴回原位
	脱落的补纸	重新加固
溜口纸	与古籍书叶颜色和厚度近似的溜口纸,脱落而未损坏	用新浆糊贴回原位
	与古籍书叶颜色和厚度近似的溜口纸,轻微损坏	揭下修复后贴回原位
托裱纸	与古籍书叶脱离的托裱纸	贴回原位
衬纸	连补带衬的衬纸,已经破损	揭下修补后贴回原位[14]
改装过的装帧形式	一部多册装订的古籍,其部分书册的装帧形式经过改装,而其他书册未经修复	以未经修复书册为样本改回原装帧形式[4]
	古籍改装的装帧形式遗存时间很短,原装帧形式依据文献记载或古籍本身又能够确定[34]	改回原装帧形式
天头地脚书背	裁切见新的古籍天头地脚书背,裁切过甚	用金镶玉装
划栏补字	划栏补字的补纸有脱落	重新加固
	划栏补字的补纸有损伤	揭下修补后贴回原位

表 3 古籍历史修复遗存的形式、状态及清除措施示例

遗存形式	遗存状态	清除措施
补纸	颜色、厚薄与古籍书叶差别较大的补纸,其物理强度差别也较大	揭下清除
	酸化的补纸,酸性物质具有迁移性[35]	揭下清除
	机制纸补纸	揭下清除
溜口纸	与古籍书叶颜色和厚薄差别较大且基本脱落的溜口纸	揭下清除
	含有木浆成分的溜口纸	揭下清除
	修复质量差(如错位、波浪形状)的溜口纸	揭下清除
托裱纸	造成古籍书叶僵硬、断裂、褶皱的托裱纸	揭下清除
	物理强度与书叶差别太大的托裱纸	揭下清除
	酸化的托裱纸	揭下清除
衬纸	不能保护古籍的衬纸,如毫无章法地补缀或填充在书叶背面的衬纸,极度破损失去物理强度的衬纸[15],加固后整体强度和平整度较好的书叶中的原衬纸,以衬带补的古籍,除了在个别书叶加入衬纸以平衡书叶局部加固后形成的厚度差外,其他部位的衬纸	清除
	与古籍书叶颜色不匹配的衬纸	清除
	损害古籍的衬纸,如酸度高、菌团覆盖的衬纸[16]	清除
化学制丝网	化学制丝网遮蔽文字,时间稍长出现硬化而导致古籍边角的损坏[13]13-15	撤除
聚酯膜	聚酯膜透气性差,膜中产生水汽,存在隐患[13]13-15	撤除
粘合剂	失去粘结力的粘合剂。修复用纸脱落,仅剩粘合剂	清除
	不合格的粘合剂,如可逆性差、污染古籍、危害古籍的粘合剂	清除
	乱涂抹的粘合剂,如涂抹过厚的粘合剂,补纸周围涂抹过多的粘合剂	清除,不追求过度洁净
书皮、扉页	古籍书皮、扉页是历史修复过程中替换过的,已经损坏	清除
	古籍书皮、扉页是历史修复过程中替换过的,质量差[4],或者是机制纸	清除
修复痕迹	水渍漫延痕迹	清除,不追求过度洁净

是取下后修复,都首先必须把历史修复遗存从古籍上去除。在我国出版的古籍修复技术论著乃至修复标准中,涉及古籍历史修复遗存处理技术者较为少见,且针对性不强。随着进入新的修复周期的古籍越来越多,古籍修复界迫切需要古籍历史修复遗存处理技术的指导。从古籍修复实践来看,历史修复遗存处理的关键

技术主要有:①完整揭取补纸、托裱纸和连补带衬的衬纸,尤其是在糟朽的书叶上分离酥脆的补纸、托裱纸和连补带衬的衬纸[18],而又不损伤古籍书叶及文字图像的技术。②有效软化、稀释并去除可逆性较差的粘合剂的技术。③在软化和稀释粘合剂过程中,不损伤染色剂浸染过的补纸和古籍纸张颜色的技术[25]112 – 113,防止水渍和褪色所形成的污染的技术[20]79。④当历史修复遗存去除后,清除其残留在纸张纤维中的难以溶解的材料的技术。在国内外古籍修复界使用的历史修复遗存处理技术中,有些把传统技艺和当代技术相结合,取得良好的效果,如使用超声波蒸汽等设备稀释胶粘物[25]119,古籍修复界应不断研发、创新古籍历史修复遗存处理技术,有效指导古籍历史修复遗存处理实践,丰富古籍修复技术。

5.2 优先选择古籍物理修复技术

历史修复遗存检验着古籍修复技术的质量。古籍历史修复遗存展示了不同时期的修复技术,其中主要是物理技术,也有一些化工技术。20 世纪中期以来,不少化工材料和方法,例如制丝网、聚酯膜和粘合剂不断被应用于古籍修复,更有不少古籍修复研究者倡导使用化工材料和方法,但是古籍历史修复遗存证明有些化工材料和方法给古籍保存保护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甚至直接损坏古籍的材料和文字图像信息,可逆性差,短短几十年甚至十几年,大多已被废止,历史修复遗存也已被清除,证明这些化工技术作为古籍修复技术的安全度是很低的。古籍历史修复遗存的物理材料和方法,大都经历了长期的验证,安全可靠,成本低廉,取材便利,制作简易,可逆性强,有效延长了古籍的生命周期。因此,在古籍修复技术的选择和应用上,应该以物理技术为主,只有"物理技术在某些方面不能实现预期目标或无以解决新问题时,才可以非常谨慎地采用化工技术予以辅助"[36]。

5.3 全面推广古籍优良修复技术

古籍历史修复遗存展示了中国传统古籍修复技术的高超水平,但是,我们也发现,一些传统优良古籍修复技术早已记载在文献中,却没有广泛应用于古籍修复实践。例如,文献记载我国在公元 6 世纪前期就发明了"微相入"技术,这种技术的要领是使用与古籍书叶材质、颜色乃至纹理相同或近似而略薄的补纸,将两者的边缘纤维稍微搭上,只有透过光亮才能发现修补的痕迹,包含了古籍修复最小干预和可识别原则的基本元素;同时,"方纸而补"技术由于把剪成小方块的纸张直接粘贴在破损处、形成一个个瘢痕而受到批评[37]。但是我们在 4 – 11 世纪修复的敦煌写卷、明清时期修复的宋元善本、清代后期修复的"天禄琳琅"专藏这些重要的修复遗存中,很少见到"微相入"补纸,随处可见"方纸而补"。由此可知,发明古籍优良修复技术固然重要,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在修复实践中全面推广古籍优良修复技术,只有这样,这些技术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当前我国有许多古籍优良修复技术未被业内了解和应用,科学家和修复师之间缺乏交流,不利于古籍修复事业的发展。

5.4 系统建设古籍修复档案

古籍历史修复遗存是可贵的历史修复资源,可以展示历史修复材料、方法和效果,但难以证明修复的历史过程,不能明确显示不同修复周期的时间、地点、修复人员、修复材料的加工以及历史修复遗存的处理措施,不能明确显示古籍修复理念和原则,难以给新的修复周期提供完整、准确的历史修复信息。古籍历史修复信息的获取除了依靠古籍历史修复遗存外,还可以依靠记录历次修复周期的文字、图像、视频等档案。建设古籍修复档案是国际古籍修复界的主流共识,实际上,古籍修复档案建设是古籍修复的重要环节,意大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建立了较为规范的古籍修复档案制度[29]249,近十余年来,中国古籍修复界建设古籍修复档案的呼声较高,但是除了国家图书馆等大型及部分中型古籍收藏单位已经建设部分古籍修复档案外[38],大部分古籍收藏单位尚未着手古籍修复档案建设。文化和旅游部即将颁布行业标准《古籍保护修复档案记录规范》,古籍修复界应依据标准要求,用统一的格式、标准的语言准确记录修复材料、流程、方法对修复古籍的影响,尽可能完整保留修复工作信息,为新的修复周期提供翔实的依据[23],并经过长期积累,逐步完善,建立一个资料丰富、格式统一、信息完整的中国古籍修复档案数据库,为系统研究古籍修复技术及其应用提供资料。

6 结语

古籍生命周期中产生的一切有意义的物质和信息都应该被保留保护[39]。历史修复遗存是古籍的一部分,是古籍流传历史的真实信息,是新的古籍修复周期处理的重要内容。古籍历史修复遗存处理的理念和措施,是古籍修复伦理的重要内容,体现着社会对文化遗产的尊重和宽容程度,并随着古籍修复原则和修复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进步。实践证明,古籍历史修复遗存处理措施越规范和科学,古籍历史修复遗存就越客观

和真实,古籍修复质量就越有保证,古籍生命周期就越长,反之亦然。我们应有这样的共识,即尽量不对古籍修复历史遗存形态施加修复干预[25]99,如果必须修复干预,也要最小规模,使之得到最大程度的保留,与新的修复周期的修复技术一起,继续发挥其延长古籍生命周期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肖振棠,丁瑜.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0.
[2] 潘美娣.古籍修复与装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12-113.
[3] 张平.《永乐大典》修复与保存方法分析[C]//中国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编纂600周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365-370.
[4] 杜伟生.《永乐大典》修复始末[J].国家图书馆学刊,2004(2):64-68.
[5] 张平.对于敦煌遗书修复工作规范化问题的思考[C]//林世田,蒙安泰.融摄与创新:国际敦煌项目第六次会议论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87-92.
[6] 胡玉清.敦煌遗书中常见破损及其修复琐谈[C]//林世田,蒙安泰.融摄与创新:国际敦煌项目第六次会议论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112-118.
[7] 张志清.敦煌遗书保护与"中华古籍特藏保护计划"[C]//林世田,蒙安泰.融摄与创新:国际敦煌项目第六次会议论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1-15.
[8] 林世田,萨仁高娃.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本《金光明最胜王经》古代修复简论[J].敦煌研究,2006(6):183-191.
[9] 杜伟生.古籍修复原则[J].国家图书馆学刊,2007(4):79-83.
[10] 张平.浅析古籍修复的基本原则[J].文津学志,2010:294-301.
[11] 林世田.敦煌遗书古代修复简论——构筑4-11世纪中国书籍修复史框架[C]//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百年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杭州:2010:434-446.
[12] 谷锦秋.山西博物院善本古籍修复现状调查及案例分析[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7(3):109-112.
[13] 方广锠.总序[M]//方广锠,李际宁,黄霞.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馆藏目录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14] 朱振彬.宋刻《入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纲目》的修复问题[J].文津学志,2012:400-404.
[15] 朱振彬.关于国家图书馆藏"天禄琳琅"珍籍的修复[J].文津学志,2016:336-342.
[16] 朱振彬.国家图书馆"天禄琳琅"专藏修复札记二则[J].文津学志,2018:424-429.
[17] 崔志宾."天禄琳琅"珍藏中前人修复遗存及解决措施综述[J].文津学志,2017:484-496.
[18] 田婷婷.脆弱文献的修补、加固与补纸的选择加工——"天禄琳琅"藏书《唐文粹》修复纪要[J].文津学志,2019:369-377.
[19] 王国强,石庆功.古籍修复性破坏原因分析及预防措施探讨[J].图书馆论坛,2018,38(11):164-171.
[20] 万群.天津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残片的保护修复[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9.
[21] 李洋.古籍奇珍"天禄琳琅"将修复[N].北京日报,2013-08-28(8).
[22] 冀淑英.保护古籍 继往开来——记著名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先生[C]//张世林.学林往事.北京:朝华出版社,2000:1136-1143.
[23]《古籍保护修复档案记录规范》编委会.《古籍保护修复档案记录规范》行业标准编制说明[EB/OL].[2021-09-02].https://www.docin.com/p-2041725520.html.
[24] 黄丕烈.黄丕烈藏书题跋集[M].余鸣鸿,占旭东,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314-316.
[25] 吴芳思,伯纳德.寻踪敦煌古书《金刚经》:世界纪年最早的印本书籍[M].袁玉,译.崔翔,校.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26] 王国强.中国古籍保护方法南北差异的原因、意义及启示[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0,38(1):93-98.
[27] 林明.文献修复糊方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2(3):71-74.
[28] 孙殿起.记伦哲如先生[C]//雷梦水.书林琐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90-94.
[29] 布兰迪.修复理论[M].陆地,编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
[30] 王国强.中国古籍修复可识别原则、技术及应用[J].图书情报工作,2020,64(6):33-38.
[31] 比尼亚斯.当代保护理论[M].张鹏,张怡欣,吴霄婧,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170.
[32] 张平,吴澍时.古籍修复案例述评[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8.
[33]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古籍与文书修复导则[Z].宁波:2015:5.
[34] 臧春华.安徽省图书馆藏《正德三年进士登科录》的修复[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5,27(2):114-121.
[35] 吴小兰,穆笛,沙明金.明正统十二年司礼监刻本《书集传》修复研究[J].图书馆界,2018(4):57-62.
[36] 王国强.中国古籍保护技术体系建设的基本路径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3,57(8):74-77,96.
[37] 贾思勰.齐民要术校释[M].缪启愉,校释.缪桂龙,参校.北京:农业出版社,1982:163-164.
[38] 杜伟生.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工作60年[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8(9):59-63.
[39] 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威尼斯宪章[EB/OL].[2021-05-23].https://wenku.baidu.com/view/c85e6646f7ec4afe04a1dfa0.html.

王国强. 古籍历史修复遗存的形式、处理措施及启示[J]. 图书情报工作,2022,66(2):74-81.

Forms, Treatment Measures and Enlightenments of Historic Conservation Remains of Ancient Book

Wang Guoqiang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Historic conservation remains are an integral part of ancient books, are the objects of the new ancient book conservation cycle. The study of them can both enrich conservation technologies and enhance the conservation quality of ancient books.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studied the forms and treatment measures of historical conservation remains of ancient books by induction and case method. [Result/conclusion] The forms of historic conservation of ancient books include materials, methods and marks. The measures of historical conservation remains, such as retaining, conservation and clearance, should be taken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situation. The enlightenments of the historical conservation remains of ancient books to the conservation of Chinese ancient books are actively researching and developing the treating technology of historic conservation remains of ancient book, giving prior choice to the physical conservation technology of ancient books,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excellent conservation technology and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ing conservation archives of ancient book.

Keywords: ancient book conservation historic conservation remains of ancient book conservation cycle conservation technologies ancient book preservation